

今夜星光灿烂

王安忆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今夜星光灿烂

王安忆
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夜星光灿烂 / 王安忆著. —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
2013.11

ISBN 978-7-5133-1285-1

I. ①今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4864 号

今夜星光灿烂

王安忆 著

丛书策划 段晓楣
责任编辑 汪欣
特邀编辑 毛文婧
责任印制 付丽江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出 版 人 谢刚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纸张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71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1285-1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公司联系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- 我的老师任大星 / 003
小镇上的作家 / 008
走通一条河 / 014
岳丁的故事 / 026
怀念萧军先生 / 030
怀念倪慧玲 / 034
凯里 / 037
岛上的顾城 / 045
黄土的儿子 / 053
阿东的语录 / 060
陈凯歌与《风月》 / 061
重建象牙塔 / 074
残疾人史铁生 / 080
见葛优 / 084
欢喜渡 / 087
立此存照 / 094
盛曙丽说 / 096
送君送到大路旁 / 098
港人彦火 / 101
摹写的精神 / 104
中国音乐在中国 / 109
仁者寿 / 117

英特纳雄耐尔 /	122
精诚石开 /	129
欧刀吴斧削江郭 /	137
执缚者哀 /	145
香港的说梦人 /	148
今夜星光灿烂 /	150
香港人 /	160
我们和“叔叔”之间 /	165
去汪老家串门 /	170
同学伊拉爷 /	173
纤纤女儿心 /	177
我看孙小琪 /	181
旦复旦兮 /	185
东边日出西边雨 /	189

第二辑

“我是一棵蒲公英的种子” /	199
我们家的男子汉 /	205
记一次服装表演 /	211
两个邮递员 /	213
我的同学董小苹 /	215
刘教授和中国当代文学 /	226
李选择什么 /	229
一个孩子和几个大人 /	232
陕南村一家 /	236

男子汉成人 /	238
老李 /	249
寂寞 /	253
男之俊 /	255
女之情 /	257
指路的小孩——附《屯门的轻铁》 /	259
手艺人 /	262
小范 /	264
政协会议上的人和事 /	266
青青河边草，绵绵思远道 /	270
美丽的孩子 /	276
警察的故事 /	278
年轻多么好 /	280

第一辑

现在，我们要孤寂了，那一个时代逐渐成了追忆，没有依傍，要由我们独自担纲起自己的日子。我们能担纲得起吗？我们能像您那样自省，以告诫来者？我们孱弱的精神能承起您的热情，以传给来者？

我的老师任大星

一九七八年底的一天，接到《少年文艺》的电话，要我立即去编辑部，谈谈一周前寄给他们的一篇小说《谁当选？》。

就在这天，我认识了任大星老师。确切地说，是贴近地看见了任大星老师。因为很早以来，他对我就不是陌生的了。小时候，我无数遍地读过《吕小钢和他的妹妹》、《刚满十四岁》、《耐心的中队委员》、《野妹子》等等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那些无聊而乏味的日子里，我手边一直有一本精装的《儿童文学作品选》，那是从妈妈送到废品站的书堆里硬扣下来的，其中，就有一篇《吕小钢和他的妹妹》。漫长的十年过去了，我从一个孩子长成了大人，到了《儿童时代》社工作，开始与儿童文学打交道。有一次，我去听一个儿童文学讲座，有人告诉我，那作报告的人就是任大星。远远地，看不清，也听不清，他的声音似有些喑哑，而麦克风效果又不太好。

这会儿，我坐在他对面，相距只几十厘米。不过，看见他本人的愉快却远远不及看他作品的心情。他作品中那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，在他身上不大能感觉到。他瘦削，很客气，使人感到有点拘谨。他说的一口绍兴话，听起来也远不如作品里的语言生动、活泼。

聆听了意见，取回稿子，开了两个夜车，急匆匆地改了出来。连抄都来不及，就剪剪贴贴地又送了去。好像去晚了一步，人家就会变卦了似的。

铅字对于初学写作的我，有一种神秘感，一旦看到自己的东西被印成铅字，激动得简直透不过气来。稿子送去后，就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等待。

又过了一周，一个寒冷的雨天，楼下传达室打电话上来，说有《少年文艺》的同志找我。我连走带跑地下了楼，走进接待室，看见了任大星老师。他坐在一张宽大的乒乓球台边上，显得更瘦削了。他从手提包里取出我的稿子，对我说，我的字写得太潦草，最好能抄一抄。他又说，这也是一个创作态度问题，要认真。他的话很直截了当，口气却好像很抱歉，很遗憾。我简直无地自容了，赶紧拿过稿子，压在胳膊底下，再也不敢看一眼。他又说了几点小意见，就站起身告辞了。前后总共只坐了一刻钟。我想留他再坐坐，可也明白该说的都说了，除非再来几句“今日天气，哈哈……”，而我看出，他是极不善于此道的。他走了，撑起一把很大很笨重的伞，走进了细细蒙蒙的寒雨中。

当天晚上，我就开始抄稿子。当我还没掌握好“横平竖直”的写字基本要点，老师就被赶下讲台。这下子可得了自由，写起了“草体字”，我以为字写得叫人看不懂才是“水平”。于是，我的字便呈现了一派无人管教的赖样，简直无可救药。这天我写得极认真，每一笔一划都极下工夫。稿子寄去不几日，就收到任大星老师的一封短信，信上说：“小楷一百分！”过了几天，接到任大星老师电话，告诉我，小说已发一九七九年第四期，《谁当选？》这个题目太简单，是不是改成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》？他的绍兴口音，很滑稽，叫人很难听清，他重复了好几遍。最后他急了，便用绍兴味很重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谁、是、未、来、的、中、队、长！”这回我听清了，却险些儿笑

出声来。说真的，我常常给我的作者改题目，却从未想到去征求一下意见。我以为任大星老师这么做是多余的，更何况我是这么一个无名小辈。

后来，我听一位江苏的青年作者说，他给《少年文艺》投稿，用的稿纸很破烂。任大星老师细心地把那破纸片一块一块地贴补起来，像修补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。而这稿件的作者年轻得像个娃娃，连胡子都没有呢！我不由想起在电话里，他那句绍兴味极浓的普通话，却一点也不想发笑了。

“任大星老师很尊重我们。”那年轻的作者说。

我点点头。

我想起了我所收到过的那些油印或铅印的退稿信，想起自己心爱的段落被编辑大刀阔斧砍掉的遭遇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又在《少年文艺》发了一些东西，同任大星老师打了几次交道。时间总是很短，谈完稿子就走。他不会寒暄，不会闲聊，不会没话找话。有话就说，无话便只有沉默了。一沉默，他又感到怠慢了对方，十分不安。然而，假如对方要没话找话，寒暄几句天气，表示一些感谢，他则越发不安起来，以至于惶惑了。

他似乎是不适合当编辑的，因为他没有编辑外交的手腕。可是，作为一个编辑，他对作者是尊重的。无论作者是名人，还是无名之辈。这尊重是真诚的，绝无一点做作。

一九八一年三月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成都召开儿童中长篇小说座谈会，我有幸同任大星老师分在一个小组。一个小组同志常在一起活动，彼此熟悉得很快，讨论起来很随便，很活跃。大家抢着说话，

比着声高，争论儿童文学的功能：为了教育还是为了审美；发着牢骚：儿童文学作品没有评论园地，对儿童文学作家不够重视；谈着创作的疾苦：作品不反映尖锐矛盾，引不起反响，反映了却得不到发表……回头一看，任大星老师静静地坐着，于是大伙儿一致要求他发言，谈谈看法。他略略推辞了一下，又稍稍沉吟了一会，开口了：

“我写的东西，必须是要使自己最最动情的。”他说，似乎从大家争论的问题上游离开去了，可大家都安静了下来。

“我曾经碰到过一些电影厂的编剧，他们说：‘这种电影我不要看，我才不看呢！’而他自己的工作却是在编这样的电影。这不应该。他创造的东西必须是他主张的，必须是他自己动情的。”他渐渐地提高了声音，努力地与绍兴口音作着斗争，咬准普通话。因为在座的有不少同志是北方人。

“有一次，我听一个年轻作家说，他写过的东西，自己从来不看，不喜欢看。我感到十分奇怪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要去写呢？”他认真地说。

“当然，光靠动情也还不够，还有个构思的问题。写《刚满十四岁》的时候，我常去学校。有一段生活相当动情，在一生中很值得怀念。我想写，写了十几万字，主要写一个辅导员。‘文化大革命’时，当废纸卖了。在运动中，我又忍不住重新写，写了五六万字，‘批林批孔’时又卖了。后来又写又没成，写不下去，气得把稿子撕了。女儿又帮我贴了起来，我还是要写的，真苦恼……”

他侃侃地谈着，我第一次听他说了这么多话，却并不感到有丝毫的

不自然。他想说的时候就说，不想说的时候决不作假。同样，他写作也是如此，想写的才写，不想写的决不虚情假意，来几句“啊！呀！哦！……”

成都会议以后，过了一段日子，我有公事去《少年文艺》，遇到了任大星老师，他悄悄地告诉我：

“我那个东西，好像一把钥匙开了锁似的，写下去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他点点头。那幸福的神情是我很久不能忘记的。

以后，每当我看到那些生编硬造的所谓小说，看到那些荒诞不经的所谓电影，看到那些矫揉造作的所谓抒情诗，看到一切功利主义的东西，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任大星老师。

他作为一个作者，对读者是尊重的。无论这读者是大人，还是孩子。这尊重是真诚的，他从来不俯就地对孩子说话，所以会有那么多孩子喜欢他的吕小钢、吕小朵，他的中队委员，他那些操着绍兴口音、捕鱼捉蟹的小伙伴……孩子们的叫好不那么引人注目，不那么得到重视，可他们的叫好却充满着真情，绝无一点功利的目的。孩子是最懂得真诚相交的。

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是他真诚以待的读者；当我学着创作时，是他真诚以待的作者。如今，我在做编辑了，又在学着做小说了，在学着一切必要知识的首先，应该学会真诚地为人。在心底，我一直把任大星同志当作我的老师。

一九八一年

小镇上的作家

一九八〇年，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，可真是群星璀璨：蒋子龙、叶文玲、孔捷生、陈国凯、张抗抗、竹林、叶辛、古华……一代风流。我所以能进讲习所，是因为多了一个女生的床铺，浪费了岂不可惜，又正巧，这个名额给了上海，而上海的女作者均在大学里读书，便让我来了，实在是侥幸。

老师将我们三十几个学员分了组，我们小组的组长是古华。轮到值日的时候，他便带领我们打扫课堂——实际上是一个饭堂。扫得屋子尘土弥漫，再也分不清你、我、他，然后才想起泼水，将那尘土和成了泥。陈世旭最负责的是擦自己的桌子和板凳，擦起来一丝不苟。并且总将板凳调换成最稳固、结实而又舒服的。我不免分享了他的劳动，因为他和我是同桌。

能够参加讲习所，坐在讲习所的课堂上，心里是又骄傲而又惭愧。我总是认真地听，认真地记，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恭恭敬敬地记下来。陈世旭不记，抱着胳膊东张张，西望望，时而轻蔑地瞅瞅我和我的厚厚的笔记，似乎连听都没在听。可是，有时候，他会忽然地兴奋起来，竖起了耳朵，打开本子，潦草地写上几行。同时对我指导性地说一句：“这个可以记。”比如，那次听吴组缃老先生讲《红楼梦》，讲到作家的主观意念和表达的客观，大意是曹雪芹写作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并

不具备反封建的意识，他甚至并没认识自己所居时代的特性。他只是感叹人生无常。可是他表现出来的现实却是反封建的，甚至在今天，还有现实意义。

上课常常是整整一上午，他常常会觉得无聊，便要和我搭话。能这样贴近地聆听一位得奖作家的教导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他谈文学，谈艺术，谈天南海北，教我说：“你要多作一些人物素描的练习，不要去想这个人物将表达什么，将是什么典型，而只是真实地描写出来，和生活中的原型活像就行。你看，学画，首先第一步，不是要画素描吗？”于是，上课时，为了听他谈文学，我常常错过讲台上的讲课，我的笔记开始日益潦草。

有时候，他念诗给我听，是他自己写的诗，那是非常好的诗。我听了以后常常很激动，手忙脚乱地找纸，说：“你念慢一点，我记下来。”他打开他的笔记本，“唰”地撕下一张，刷刷地写了起来，写好后便往我面前一推，问我：“你有什么诗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我惶惶然地回答，“不过，我记得几首普希金的诗，很美的诗。”于是，我把普希金的诗抄在纸上，推给他。我只能用普希金与他对抗了。

这时节，《收获》上要发我的小说了。我的小说是第一次上《收获》。由于《收获》发作品要用作者自己的签名，于是上课时我便什么也不写了，只写自己的名字，满纸都是“王安忆”、“王安忆”、“王安忆”。他则趁机大谈书法：“最好的字是返璞归真，这也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。”然后，便大言不惭地写了几个“王安忆”，给我作帖，让我照着练。一边指导：“不要把‘忆’的那一钩跷得太高，高了就做作了。”

在他的教唆下，我们上课就干着这些。

一九八〇年，真是他走红的一年，小说得了一九七九年度全国奖，名列第二，吸收入中国作协，被选为江西分会理事，又生了一个大胖儿子。他得意非凡，说：“我马上去领了独生子女证。”似乎假如是个女儿，他还将一个接一个地生下去。他把他儿子的照片拿给我们看，那是个愣小子，有着一双大而黑的眼睛和一个圆圆扁扁的鼻子。他说：“眼睛像我，鼻子像他妈妈。”“哼！”我们不以为然地把照片掷还给他。

“喂，你爱人干什么的呀？”我们问他。

“以前是文工团的，现在是打字员。”他说。

“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”我们进一步问他。

“那时候，我终于从农村抽上县里，转了户口，开始想媳妇了。就托我的朋友给我找一个。找来几个，我都不满意。有一天，我和朋友一起去看文工团演出，一群跳舞的女孩子，我一眼就看中了她：‘就是她，就是她！’第二天，我的朋友就想办法把她找来。她很小，很害羞。我对她说：‘你也不要紧张。咱们先接触接触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。’就这样，我们好了，谈起来了。可是，我们之间发展得太顺利，太平静。我决定考验她一下，这时候，还好，我们单位里有了点儿小事，我就对她说，事态是如何严重，弄不好，我又会下到农村，她被我吓哭了，但是终究没有离开我。于是，我们便结婚了。”

“你们有房子吗？”我们问。

“有，挺好的。”他很满意，忽而又想起故宫光绪皇帝的新房，“光绪皇帝怎么住那样的房子，在这种房子里结婚，怎么会有激情。”

“你写的小说，她看吗？”

“她对我的小说和稿费都没有兴趣。可是，她给我生了个儿子呀！”
他骄傲极了。

“唉，儿子！”艾克拜尔只能叹气，他的爱人还没生，不晓得是儿子还是女儿。

“女儿也挺好。”他安慰艾克拜尔。

在北戴河度假的时候，艾克的爱人生了，是个儿子。他请我们去“起士林”吃“圣诞”。陈世旭不让他请：“我的儿子比你的大。而且，在我们那院里，你们五四年出生的人都叫我叔叔。”“去——”我们一起嘘他。其实他只比我们大五岁。

“圣诞”来了，他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，把攒奶油平分给我们：“消受不了，看来我只能吃吃野菜。”“你怎么这样土？”艾克说。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会有人拒绝奶油。

我们这才想起他是从小镇上来的。在这之前，我们都错觉得他是个将军呢！

住在大海边，我们一有空就去泡在海水里，或者躺在沙滩上。这天早上，他一个人游得很远，一直游到了防鲨网跟前。不料，让防鲨网绊住了脚，怎么也挣不脱了。他几乎大叫“救命”，叫了也没有用。没有人能听见，他离人群太远了。可是命里注定不该他完，他终于摆脱羁绊，游了回来。本该是值得庆贺的，而他却惴惴不安了一天。他说，那是一个不祥的预兆，又说他今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这一天，他说什么也不肯下水了。他的预感影响了我们，使得我们也疑神疑鬼起来。